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

孟祥才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由事物内部存在的矛盾推动的。人类社会从其大约一千万年前出现那天起，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下前进。生产力表明人对自然的关系，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生产关系表明人对人的关系，解决的是人与人的矛盾。人类一面从事对自然的斗争即生产斗争，一面从事人对人的斗争即社会斗争。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就是在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的互相制约和互相促进中不断前进的。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由于“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①。因而生产斗争与社会斗争相比，就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或终极动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是由此出发，用几种不同的表述方法，特别强调了生产力、生产斗争、经济事实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②生产力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基础”^③。“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④。“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⑤。“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⑥。

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又是辩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的互相制约和促进，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虽然贯串始终，但由于矛盾双方是处于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因而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或直接动力就表现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着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上层建筑基本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劳动人民的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生产时，生产力的发展或生产斗争就表现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样的时期无疑占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但是，也有这样的时候，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已不能发展，不变更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就要崩溃时，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设的社会斗争就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或者说直接动力。

在阶级社会里，或者说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由于社会斗争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所以，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就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在这里，生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依然是不变的。但是，由于这时的生产斗争始终是在两个敌对阶级的对抗中进行，不仅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层建筑的更替、一种社会形态向

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一般需要通过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革命战争去完成，就是同一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同一生产关系某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的调整，亦不能靠生产力的发展自发地完成，而必须依靠阶级斗争的推动。因此，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不仅一直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而且，每当历史发展到全部变革或部分调整生产关系、全部摧毁或部分调整上层建筑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阶级斗争，主要是革命战争就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作用超过生产斗争。例如，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诸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以及在阶级社会里暴发的所有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起义和战争，其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就是与共同时进行的生产斗争无法比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①、“真正动力”^②、“直接动力”、“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③、“政治变革的基础，并且最终决定一切政治变革的命运”^④、“是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⑤、“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⑥。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象生产斗争一样地贯穿始终。它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虽然表现在许多方面，但归根结底是落实到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斗争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下面，让我们以西汉末和东汉初的历史事实为例，探索一下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怎样交替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西汉王朝自武帝后期开始走下坡路，频繁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上统治阶级“争于奢侈”、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空前加剧，其间更伴随着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阶级矛盾逐步激化。不少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关东地区流离乞食的流民就达二百万人。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受到严重阻碍，零星的农民革命之火已在中原广阔的原野上点燃了。昭、宣之后，贵族、外戚、官僚、豪强地主和富商大贾更加荒淫无耻、贪婪残暴，搜取尽锱铢，进一步加紧了土地兼并的步伐。成帝时丞相张禹占关中膏腴之地四百顷，哀帝一次就赐给宠臣董贤良田二十万亩。农民更多地被从土地上排挤出来，以致长安市上流民成群，哀声震宫阙。离开土地的农民，更多地变成了依附于豪强地主的农奴，另外还有相当部分沦为“与牛马同栏”可以在市场上出卖的奴婢。连哀帝时的谏大夫龚遂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情况是“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制度太奢、刑罚太深、赋敛太重”^⑦。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以致正常的简单再生产也难以为继。到这时候，生产斗争已无法发挥其作为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作用了。用阴谋手段窃夺汉朝政权的外戚王莽，企图通过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但由于他打着复古旗号推行的王田、奴婢等政策完全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因而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由此引出了绿林、赤眉为代表的历时十年的农民大起义。革命的农民英雄们以铁血手段推翻了黑暗腐朽的王莽政权，把一大批贵族、官僚、豪强地主送上断头台。农民在战争中得到部分土地，人数众多的奴婢通过斗争获取了自由。封建生产关系对农民的束缚暂时相对地有所松弛。这一切，就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在农民战争沉重的锤击之下，以刘秀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在重建封建王朝的过程中，从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革命的某些成果，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将封建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朝着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方向调整。从公元二十六年至公元三十八年，刘秀先后颁布了六次解放奴婢、三次禁止虐待杀奴婢的诏令，使相当一批奴婢改善了自己的地位。而“卖人法”和“掠人法”的公布，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自耕农沦为奴婢的趋势。此后，中国封建社会奴婢的数量就大大减少了。为了

使大量的流民回乡生产，刘秀一面不断地发布赐爵令，一面通过“假民公田”的办法使之与土地结合。又用赈济、减刑戍边、释放囚徒等措施稳定自耕农的地位、增加劳动力、缓和阶级矛盾。在上层建筑领域，刘秀还实行了加强中央集权、精兵简政，澄清吏治、提倡节俭、恢复三十税一等措施，以减轻对农民的赋税和徭役剥削。这样，通过大规模的剧烈的阶级斗争，就使西汉末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极不适应的关系得到调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极度尖锐的矛盾趋向缓和，阶级斗争的形式由大规模的武装对抗转入和平的政治和经济诸方面的斗争。由此，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也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阶级斗争转化成生产斗争。由于广大劳动人民在可以忍受的剥削条件下辛勤劳动，东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过了西汉。在农业方面，耕作工具从短辕一牛挽犁代替了长辕二牛抬杠式挽犁，以全铁制犁铧代替了V形犁铧。牛耕从中原向江南和西北地区推广。黄河得到治理，多年免除水患。水利灌溉较前更为发展，提水工具以翻车和渴乌取代了桔槔。水碓首次发明出来并以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在手工业方面，冶铁、纺织等部门超过西汉的水平和规模，造纸术经蔡伦改造已经可以大量生产。社会经济在光武末年和明帝时期出现了繁荣局面。史书记载，“自建武水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帝）惠（帝）之间同。”^④到明帝晚年，已是“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牛羊被野”、“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⑤了。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显然已不是趋向缓和的阶级斗争，而是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了。

二

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一系列问题。不少同志在文章中提出了许多令人发省的见解，但也有一些提法，我们感到大有商量的余地。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虽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如果搞得太多，历史发展并不见得快。证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比欧洲日本多得多，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恰恰比欧洲和日本慢得多。

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某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⑥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象孪生的姐妹一样共同存在、贯穿始终。既没有不受生产斗争制约的阶级斗争，也没有脱离阶级对抗单纯发展着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有着自己运动的规律，经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存在，没有办法人为地任意增加或减少。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众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是由于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压迫激起农民阶级的愤怒反抗呢？还是因为中国的农民阶级本性就逞强好斗，硬是随心所欲地无端地制造一起又一起阶级斗争的风暴呢？当广大农民阶级失去田宅，穷得只剩下骨瘦如柴的两手，想生产而“无立锥之地”，等待他们的又只有“七死”、“七亡”时，我们是赞扬那些“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铤而走险、不计成败，用鲜血和生命向统治阶级争取生存权利的英雄呢？还是歌颂那些“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⑦，至死都对皇帝和地主感恩不尽的奴才？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如果从西周算起，绵亘近四千年。就是从魏晋算起，也历时近一千六百年。历史之长，在世界主要文明大国中是仅见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斗争之猛烈，在世界历史上更是仅见的。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提到历史学家的面前：究竟次数多、规模大、斗争猛烈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还是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发展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较慢，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史学家如范文澜同志等，对此曾作过有意义的探索。我们认为，根本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封建的生产方式特别牢固。一家一户的小农，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一代又一代，几乎使用相同的生产工具，在同样的规模上进行着内容相同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所得成果，除交租纳税外，仅能勉强满足不能再简单的生活需求。这样的生产方式，“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换。”^⑩“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⑪一次又一次的巨大的农民战争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但却不能彻底改变这种生产方式。而一直到明清时期才在中国局部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还远远不足以动摇它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正确分析过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这种……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⑫二是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特别残酷。自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农民战争过后每一个新建王朝的初期，农民大体上争到了一个过得去的生产条件。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是地主阶级贪婪残暴本性的恶性膨胀，土地集中，租赋加重、高利盘剥、徭役滥兴。农民辛苦创造的剩余劳动，被统治阶级用强力聚敛起来，但却没有变成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而是被恣意挥霍，消蚀在歌台舞榭之中。当广大农民阶级忍无可忍再次起义反抗时，招来的必然是统治阶级的疯狂屠戮。再后是群雄逐鹿，杀人如麻。其间有时还夹杂着国内各民族统治者间为争夺中央统治权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社会生产力往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劫后余生者虽然又在一个新的王朝得到暂时复苏，但在封建经济的一片繁荣中又孕育着新的破坏。“中国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生活。”“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⑬如果硬说农民战争次数较多也是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原因的话，那末，这个原因不正是上面两大原因尤其后一原因造成的结果吗？在我们看来，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较多，恰恰应该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够缓慢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史事实明如火。是农民战争推翻一个又一个的封建王朝，摧毁上层建筑中最腐朽的部分，改造了封建统治；是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扫荡了最反动最腐败的那部分社会势力，暂时减弱了加予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是农民战争改造和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那些环节，给生产的发展造就了较好的条件；是农民战争对封建的思想体系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猛烈冲击，使民主思想的火花在历史上不断闪现；是农民战争迫使统治阶级，尤其是新建王朝的统治者将其政策朝着顺应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调整，使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成为可能，等等。所有这一

切，归根结底，都是在不同程度上解放生产力。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论断，“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⑩则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历史上汉、唐、明三代生产力的较快发展和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显然与秦末、隋末、元末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离开农民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而单纯到刘邦、李世民和朱元璋的圣谕诏诰中去寻找社会发展的原因，恐怕是一种舍本趋末的办法。

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每次农民战争的作用亦有大小显味之分。确实在某些农民战争之后，生产力没有显著发展，社会经济也没有呈现繁荣。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归罪于农民战争。黄巾起义只是暂时地局部地打击了东汉时期逐渐膨胀起来的豪族地主势力，因而也就造就了曹魏时代短暂的升平景象。之后，由于江南半壁河山处在腐朽的世族门阀势力的统治下，中原地区又被落后的少数民族奴隶主贵族的铁骑横加践踏，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受到严重阻碍。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都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延缓了中国沦为殖民地的进程。但是，由于它们既没有把外国侵略者赶出中国，也没有推翻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黑暗腐朽的清王朝，因而其解放生产力的作用就不十分明显。

有的同志认为，在承认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还必须如实地承认农民战争所起的破坏作用。在他们看来，这也是农民战争延缓历史发展的根据之一。任何战争都必然无可避免地造成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破坏，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农民战争既是两个对立阶级的生死搏斗，其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规模大、时间长的农民战争更是如此。因为它往往造成某些地区正常生产的中断，使人口流亡，经济凋残。大量文献资料以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字描绘着农民战争之后的荒凉景象：城廓为丘墟，村落生荆棘，生民百遗一，千里无鸡鸣。但是，这里应该搞清的问题是，第一，当时如果不爆发农民战争，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是否就不会遭到破坏？第二，造成破坏的主要责任应该归谁？第三，农民战争的进步作用和破坏作用，何者是主流？事实是，每逢农民革命暴发的前夕，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于生产力的戕害和社会经济的破坏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赭衣半道、圜圜成市”、“道死者相望”、“死人以沟量”。只有用暴力手段才能阻止这种破坏的继续发展。揭竿而起的农民选择的正是拯救社会生产力的正确道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革命的农民战争虽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但是，与封建王朝的官军、地主武装对农民的屠戮和对财物的洗劫相比较，就不可同日而语。“宁逢赤眉，勿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⑪这是新莽末年没有参加起义军的“守法”农民的回答。问题十分清楚，农民战争中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主要应归“功”于那些镇压农民军的帝王将相的“深仁厚泽”、“盛德大恩”，将其一股脑儿推到农民头上是不公平的。更重要的是，农民战争的破坏与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当我们面对砍伐古老森林的拓荒者所开辟的崭新天地的时

候，实在没有必要责怪他们把木屑撒落在地上。还应该指出的是，农民战争也并不是对生产力和社会经济一味造成破坏，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农民战争中，不少农民英雄们还是比较注意发展生产的。宋代钟相、杨么起义军在洞庭湖、元末农民军毛贵部在山东，明末李自成起义

军在河南，太平天国在苏、浙、皖、赣等地区，都实行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并且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把农民起义军一律与打家劫舍联系起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封建社会的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所以他们的革命斗争总是陷于失败。因而，农民阶级最好是少搞阶级斗争，多搞生产斗争，如此，社会的发展就快了。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恰恰又创造出埋葬封建制度和使农民获得解放的根本条件。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有理，实际上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观点。

“不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①中国农民是生产斗争的主力军，在封建社会里，真正致力于生产斗争的正是他们。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一直是在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抗中进行的，所以，使农民全力从事生产斗争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使农民与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结合；第二，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超过这样的限度，即留给农民的生活资料能够补偿他们的劳动消耗和养育子女。一般说来，只要统治阶级的剥削不越过此线，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也就不会诉诸武力。但事实上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总是每过一段时间就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使剥削量超出常规。“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农民于是不得不以锄头作刀枪，把武器的批判提上历史日程。由此看来，农民有时不得不暂时忍痛放弃生产斗争，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责任完全在贪得无厌的地主阶级。事实上，当农民阶级用武力从事反抗封建统治斗争的时候，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妙，他们的纲领口号显示出怎样诗意的光辉，他们实际上争取的也不过是上面那两点从事生产斗争的基本条件。经过一场血雨腥风的鏖战之后，多数情况下农民也在事实上暂时争得了这样的条件。无数历史事实揭示的真理是，不是农民阶级因好斗成癖而放弃生产斗争，而是为了争得进行生产斗争的基本条件举行起义和反抗。鲁迅曾深刻地指出，历史上的中国劳动人民一直交替生活在两种状态下：“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②农民阶级到了做奴隶都不可得的时代，你让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生产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古代的诗人曾以令人心醉的文字描写过和平的劳动与生活。但是真实的历史却告诉人们，和平劳动的条件往往是被压迫阶级浴血搏斗的结果。在阶级社会里，伴随和促进生产斗争的，并不是美妙恬静的田园诗，而是以血和火的文字谱写的阶级斗争史。

①毛泽东：《实践论》

②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③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8—8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⑤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48页

⑥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⑦恩格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⑧列宁：《再论杜马内阁》《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⑩列宁：《〈警察司长洛普兴的报告〉序言》《列宁全集》第8卷第176页

⑪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5—446页

⑫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1

页

⑬《汉书·龚胜传》

⑭《后汉书·刑法志》

⑮《后汉书·明帝纪》

⑯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0—501页

⑰列宁：《纪念葛伊何伯爵》《列宁全集》第13卷第362页

⑱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⑲毛泽东：《组织起来》

⑳马克思：《资本论》1975年版第1卷第397页

㉑㉒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㉓《汉书·王莽传》

㉔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

㉕鲁迅：《坟·灯下漫笔》

（上接29页）

席诗词的光辉，而不能说毛主席诗词的光辉就在于突破了诗词格律。又如对毛主席的个别诗句，也不应作不切实际的评价。如有人在解释“不须放屁，试看天地反复”一句时，说它好就好在以骂人的话入诗，道前人所未道，突破了古典诗词的束缚等等。

综上所述，对毛主席诗词之所以会作出不实事求是的理解，究其源，就在于中了极左路线的流毒。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显示其“高举”“紧跟”，嘴巴上喊着最最革命的词句。他们对老干部、专家、学者和其他知识分子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如陶铸同志的“罪行”之一就是他说“太阳里面也有黑点”，李达同志的“罪行”之一就是他曾对林彪鼓吹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表示了异议，结果都惨遭迫害致死。由于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界学术界禁锢得比罐头还严，一些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噤若寒蝉，总以为左比右好，左比右保险，因此导致思想上的僵化。在重点转移伊始的现在，万物昭苏，文学艺术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我们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实事求是地理解毛主席诗词，完整地准确地宣传其革命精神，研究其艺术成就和创作经验，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乃至整个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而努力。